



反壓迫實務工作——一個對台灣大陸籍與 外國籍受暴女性配偶的協助策略

劉珠利

摘要

根據統計，嫁到台灣的大陸籍與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的外國籍配偶遭遇家庭暴力事件、並且向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求助的比例，持續增加當中。台灣現階段的家庭暴力實務工作中，重視兩性間不平等權力與控制的角度，但是並未加入種族／新住民身分所遭遇的不平等的角度。新住民與家庭暴力受害者，都是反壓迫實務工作所關切的標的人口。因此本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從結構不平等與反壓迫實務工作的角度，來分析大陸籍與外國籍配偶遭遇家庭暴力事件的成因與他們的因應策略，發現台灣社會結構上對這些配偶的不平等，對這些配偶在遭遇家庭暴力事件後的因應、選擇、與生活重建，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在台灣現階段第一線家庭暴力防治社會工作人員現有的、具備性別意識的工作模式中，加入新住民所面對結構不平等的角度，嘗試提出一個結合性別與新住民身分的工作模式建議。

關鍵詞：反壓迫，家庭暴力，結構不平等，外籍配偶，大陸籍配偶

Anti-oppressive Practice—A Helping Strategy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bstract

In Taiwan, the numbers of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who originally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rn-eastern Asian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inequality has been included in Taiwan's domestic violence practice, however, the lens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that immigrants

and minority groups often experience is still missing. Immigrants and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are primary target population of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Therefore,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lens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literature concerning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who originally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rn-eastern Asi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unique experiences and needs. It concludes that structural inequality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these victims' coping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Helping strategies arising from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are added to current Taiwan's domestic violence practice.

Key words: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structural inequality, domestic violence, foreign spouses from Mainland China, foreign spouses from southern-eastern Asia.

壹、前言

一、現階段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回顧與新興議題

家庭暴力防治法自從在西元 1998 年開始實施至今（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民 97 年），已經歷經十年的時間，在這十年當中，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的議題與意識，已經在台灣社會之中生根。然而，第一線的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員都開始反應，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求助的個案與日俱增（劉珠利，民 96 年），一些統計數據也顯示，外國籍或是大陸籍女性配偶受婚姻暴力的人數在增加當中。在這些統計數據中，外國籍配偶所意指的是東南亞國家嫁到台灣的女性，例如：越南、印尼、泰國、柬埔寨等國家的女性（桃園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民 97 年），因此本文中所指嫁到台

灣的外國籍配偶，係指東南亞國家的女性。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6 年的社會指標統計指出，該年度受到家庭暴力對待的個案中，本國籍占 81.3%，大陸及港澳籍占 5.9%，外國籍占 6.8%（行政院主計處，民 96 年），大陸籍與外國籍配偶的比例相加，就占有 12.7%，雖然沒有本國籍的受害者多，但是這樣的比例仍然值得重視。然而如果從一些大陸籍以及外國籍配偶居住較多的城市的地方政府的報告數據，就可看到大陸籍以及外國籍配偶的受害人數，是不容忽視的。桃園縣政府家庭暴力受害婦女緊急安置的統計數據顯示，95 年度安置的受暴婦女，本國籍占 48%，大陸籍占 23%，外國籍占 21%，原住民占 8%（桃園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民 97 年），這個數據顯示，大陸籍以及外國籍婦女被安置的比例相加，即占有該年全年被安置婦女的 44%，是相

當驚人的比例；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統計專題報告（民 97 年）也顯示，民國 92 年家庭暴力通報人數中，外國籍為 78 人，大陸籍為 76 人，而民國 93 年家庭暴力通報的人數，外國籍為 151 人，大陸籍為 199 人，顯示出因為家庭暴力而被通報的外國籍以及大陸籍婦女的人數，是呈現倍數的成長。雖然作者所能夠找到的統計數據，以時間序列而言，並非連續性的，無法呈現自從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以來的連續性受害人特性數據，但是從這幾個數據，的確在提醒社會工作界，外國籍以及大陸籍配偶受到家庭暴力對待，是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

目前台灣的社工員在協助外國籍或是大陸籍的家庭暴力受害女性配偶時，也是運用和協助台灣本國籍受暴女性配偶相同的工作策略，而這樣的工作模式面臨一些難題與盲點，例如：社會工作人員反應，有時候百般刁難外國籍配偶的來源，其實是家中的婆婆還有一些台灣相關的法令（劉珠利，民 96 年），畢竟因為這些外籍配偶的身分的關係，即使同樣遭遇家庭暴力問題，然而問題的內涵與解決策略，和台灣籍的受害婦女是不太相同的。作者仔細分析各縣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宣導文宣也發現，內容反應出台灣的家庭暴力工作，主軸概念放在性別之間的權力與控制議題。換言之，台灣的家庭暴力工作有性別的角度，但是新住民身分的角度呢？不同的性取向的角度呢？這些角度顯然是被忽略了。雖然第一線的社會工作人員也

了解，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的問題與處理，和台灣社會文化是有相關的（陳淑芬，民 92 年），然而這個角度如何放到實務工作當中？這些已經不是社會工作人員本身注意自己對於這些新住民婦女的偏見問題，就能夠解決的。當多數第一線的社工員是接待國家的主流成員時，應該有什麼樣的方法來協助新住民？作者認為社會工作者只是高呼提高自己對於種族或是性別的意識，來面對與協助跟自己不同種族的案主，是不夠的。那麼，應該有什麼樣的具體方法可以運用來協助跟自己不同種族的案主呢？又要如何具體的提高自己對於種族或是性別的意識呢？這些問題仍然有待努力解答。

二、世界潮流中反壓迫實務工作的逐漸崛起

近年來，世界各國都開始變成多元種族並存的國家，只有單一種族所形成的國家，已經愈來愈少。然而當許多國家變成多元種族並存的國家時，並不如人們原先樂觀的期待，認為多元種族可以和平共存，共同為自己生活的土地努力。實際的情況卻是，原先生活在那一個國家／土地、居多數的主流種族，對於新來的、少數的種族，運用各種不同型式，進行壓迫。面對這樣的情況，早期當女性主義開始形成思潮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對於這種種族間的壓迫開始進行討論，例如：以討論黑人女性遭遇白種男性與白種女性壓迫，而發展出的婦女主義（womanism）或是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就

是最好的例子（劉珠利，民 93 年）。在女性主義的基礎上，人們對於壓迫、壓迫的來源、及多重壓迫開始有了意識。近年來，因為許多接待新移民的國家，都開始面臨新移民在接待國家適應時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例如：失業、以及因為失業所帶來的生活或是心理健康問題，這些新移民的問題，讓社會工作界開始關注，因而在近十年間累積發展出反壓迫實務工作（Anti-oppressive practice，簡稱 AOP）（Sakamoto & Pitner, 2005），並且在這幾年成為一個被關注與討論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Danson（2007）認為，反壓迫實務工作在多元種族的社會當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甚至是重要的工作模式。作者在今年（民國 97 年）5 月到加拿大多倫多參加社會工作研討會時，研討會的主題就是以反壓迫實務工作為主題，許多論文都提到新住民、原住民等在以英裔白種人為主的社會中生活，所面臨的困難與壓迫。家庭暴力也是壓迫的一種形式（Bartolo, 2001），多數大陸籍和外國籍配偶在台灣是屬於新住民的身分，家庭暴力受害的大陸籍和外國籍女性配偶，是反壓迫實務工作所關注的標的人口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激起作者嘗試探討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原則，是否可以納入台灣大陸籍以及外國籍配偶所面臨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中？又如何納入？的議題。

當作者因為前述的背景，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與角度時，發現台灣的期刊文獻中，一些文獻已經注意到大陸籍和外國籍配偶在台灣，所面臨到的結構不平等的問

題（王明輝，民 93 年；陳小紅，民 94 年，民 95 年；蔡庭榕，民 96 年），但是如何根據這個角度所分析的結果，提出協助的策略？這部分則是付之闕如。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者嘗試整理文獻，來回答前述的問題，提出社會工作干預的建議。

本篇論文，除了前述的背景之外，接下來將介紹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內涵、在台灣的大陸籍以及外國籍配偶所面對的結構／機會上的不平等、反壓迫實務工作與台灣的外國籍與大陸籍受害者、以及未來台灣社會工作界在運用反壓迫實務工作模式時，仍須努力之處。作者希望這一篇論文，能夠提供社會工作界在面對不同種族／新住民案主時，一個可以再納入原有工作模式中的角度。

貳、反壓迫實務工作模式的內涵

反壓迫實務工作是植基於女性主義（feminism）、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反種族歧視觀點（anti-racist）、後結構主義理論（post-structure theory）、以及後現代理論（post-modern theory）（Pollack, 2004; Sakamoto & Pitner, 2005）。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定義，現階段學者多數採用的是女性主義領域的權威 Dominelli 所提出的定義。Dominelli（1996）認為，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定義在於了解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y）如何造成對某些人的影響／壓迫，並且對這種情況與影響，提供社會工

作干預與協助；反壓迫實務工作致力於消除／減低結構不平等對於人類所造成的消權的影響，經由消除這些不良影響，進而增加案主的權能。何謂結構上的不平等？何謂壓迫？具體來說，Mullay（1993）認為所謂結構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是藉由性別、種族、宗教、殘障、性取向、地理區塊等做為不平等的分界線，讓某些團體排除於有意義社會參與滿意的生活之外。而壓迫，則是因為個人所屬團體的身分（membership，例如：女性）而導致挫折、限制與傷害，不是因為個人的能力或是努力不足，而導致挫折、限制與傷害。早期的觀點認為，壓迫的來源是性別歧視與階級歧視，後期則認為壓迫的來源是多源的，不光只有前述兩種。簡言之，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具體定義就是認為案主產生問題，主要是因為案主生活的結構中因為案主的身分等因素而形成對案主不平等對待而形成的，結構的不平等才是案主問題的主要根源，實務工作的主要協助目標，除了增加長期受壓迫的案主已經失去的權能之外，最終目標就是掃除對案主不平等對待的結構因素。

在融合了前述幾個理論之後，反壓迫實務工作並未再嘗試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理論，反倒是借用前述理論的觀點，發展出實務運用的原則。這個模式認為，協助不同種族的新住民，不是只是尊重他們的文化或是將他們的文化納入協助策略而已，如果只做到這部分，僅能說是跨文化工作模式（cross-cultural model），而反壓迫實務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從他們所面臨的結

構不平等與結構壓迫中著手。它的實務原則具有以下的幾個特色：

一、預估與分析案主問題的角度

1. 權力不平等、壓迫、邊緣化是主要的架構

接待新住民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主流社會中已經存在的刻板印象、公共論述的主要焦點等，都可能是壓迫的來源（Valtonen, 2002）。McDonald and Coleman（1999）指出，基本上壓迫的來源有數種，馬克思主義的論點中，以社會經濟做為壓迫科層的劃分來源，也就是握有較多經濟資源的族群，就成為壓迫者，反之則成為被壓迫者；另外一類的壓迫來源，則是以性別、種族、性取向等為主要的來源，除此之外，壓迫的來源與種類甚至還有科層（hierarchy）存在（McDonald & Coleman, 1999），例如主流社會中的歧視新住民的社會意識會往下導致歧視的政策產生，使得這些壓迫源綿密的交錯，形成一個相互交錯的壓迫網絡（interlocking oppression）。壓迫者握有較多的資源，也就伴隨而來握有較多的權力，權力的濫用，就會使得沒有資源與權力的被壓迫者，遭受壓迫與歧視，而成為社會的邊緣人。反壓迫實務工作在分析問題時，就用前述的架構著手。

2. 不將案主的問題視為是案主個人所造成的，或是以病理的角度分析案主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所協助的案主，都是社會中處於邊緣的案主，但是造成案主處於邊

緣的因素，是來自於結構／機會的不平等，而不是個人特質所造成的（Pollack, 2004），例如：不將遭受家庭暴力對待的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的遭遇，視為是她個人爭取自己的權益，違反了台灣傳統文化中的小女人期待所造成的；而是將案主的遭遇視為是父權社會觀念下的受壓迫者。

3. 將案主目前的問題視為是案主遭遇創傷後的結果、或是案主遭遇創傷後的適應策略

Strier（2007）指出，長期受壓迫是一種痛苦的創傷，長期受壓迫的結果，使得個人自我決定的權力與能力被剝奪，為了適應創傷的情境，因此受壓迫的人會因此而發展出適應的策略，這樣的策略或許不是一般所認為正確的。從反壓迫實務工作的角度出發時，所有案主的行為反應，甚至是失功能的行為反應，都被放在受到結構不平等對待的創傷後反應與策略來分析。

4. 預估的具體作法

Danso（2007）指出，壓迫是形成社會問題的根源，因此社會工作人員的預估目標，就必須注意案主所生活的社會政治環境，如何影響案主的生活，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做出這樣的預估之後，接下來的干預目標就是致力於讓案主脫離造成問題與困難的壓迫或是危險環境。Danso 提供的是一個預估的方向，Mullay 以及 Boushel 則提出具體的預估方法。Mullay（1993）指出和案主一起工作會談時，焦點是放在讓案主

了解目前面臨的困難，不是她個人的錯誤所造成，她們是結構（父權結構、政治結構、某種社會文化結構、法律結構等）不平等下的犧牲者，運用這個角度除了可以分析與預估案主的問題之外，同時也已經具有干預的效果，因為這個討論的過程可以提升案主的意識，減低案主的自責或是自我貶抑。Boushel（1994）指出在預估的時候，要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個是分析案主的情況是否和結構面的不平等有關，例如：案主在環境中，是否被歧視？歧視的結果，是否帶來機會、資源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與影響、甚至是虐待？另一個角度是分析案主的情況是否和所處文化中的價值取向有關，例如：案主所處的文化中，如何看待外來的人？對於案主的身分是否有特別的價值觀？是否因此而影響和其他人的來往？最後再將這兩個角度所分析到的資料，綜合整理之後，形成一個預估的結論，並根據預估結果，提供干預的策略。

二、反壓迫工作模式的干預策略

1. 協助案主時，不以專家的角色自居，應該要以案主的經驗為主體

Danso（2007）指出，儘可能平等的專業關係，並且讓案主參與協助過程的每一個步驟，是干預的策略之一，具體的做法包括：開放、清楚的溝通，讓案主了解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職責，儘可能的減低社會工作人員與案主之間的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以及鼓勵案主述說，因為面對結構／機會的不公平對待而產生的無力感。同

時，社會工作人員也應該要尊重案主的文化，提供和案主文化比較接近的服務，尊重案主從他們的生活中所發展出的知識與價值，同時也必須時時檢視，社會工作的干預，是否也形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Wilson & Beresford, 2000）。

2.由於案主在他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因為面對不公平已經被消權（disempowered），因此要增強案主的權能（empowerment），與提升案主的意識覺醒

在干預的策略部分，Mullay（1993）認為充權、提升意識覺醒、以及正常化案主的問題，是三個重要的反壓迫實務工作干預技巧。就 Mullay（1993）的觀點而言，充權的實際作法，是社會工作人員提供案主一個平等、相互學習的關係，提供資源，提供一個過程，讓案主從中改善她們的生活。提升意識的作法；是社工員經由教育、和案主對話，讓案主發展出對於結構不平等對她們的生活所造成影響的洞察力，並且從洞察力中再發展出改變情況的力量。正常化案主問題的方法，是提供資訊，或者也可以讓案主和其他有相同處境的過來人連繫，讓案主了解在她的處境下，會有這樣的結果是正常的，藉以減低案主的罪惡感以及提高案主的自我價值感。

3.社會資源提供與社會福利機構中的管理政策須考慮案主的文化，避免造成另外一種壓迫

Danso（2007）認為在提供社會資源時，必須考慮案主的文化的特殊性的需

要，以及資源的可近性，否則忽略案主文化的社會資源，將會形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除此之外，Langley（2001），Mullay（1993）以及 Pollack（2004）認為，反壓迫實務工作中對於社會福利機構中的管理政策，是否造成對某些少數族群的案主造成壓迫，也是必須檢視的重點。以受婚姻暴力婦女為例，將受暴婦女安置於收容中心之中，是干預策略也是提供社會資源。Bograd（1999）舉例，在美國的猶太裔所吃的食物在事前是必須經過猶太牧師祈福過的，稱之為 kosher，猶太裔受暴婦女如果被安置於收容中心之中，如果收容中心無法提供猶太人所需要的 kosher 的食物，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也是忽略種族差異的不平等做法。反壓迫實務工作的案主，多數是和主流社會不同的一群人，收容中心是否能夠照顧不同族群的人的需要，也是落實反壓迫的一種做法。

三、反壓迫實務工作的終極目標

受壓迫者的生活經驗，所反應的是那個社會環境以及政策上的不公平（Danso, 2007）。運用這個模式最後的目標，在於能夠集結有相同處境的人，運用與發揮集體的力量，改變不平等的結構、改善社會關係、以及改變造成壓迫以及社會排除的制度。Sakamoto and Pitner（2005）認為，反壓迫的實務工作必須同時在案主問題的個人層面以及結構層面，催化改變，才會產生效果，單方面，尤其是僅在微視層面做改變的努力，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只有從政策與法律層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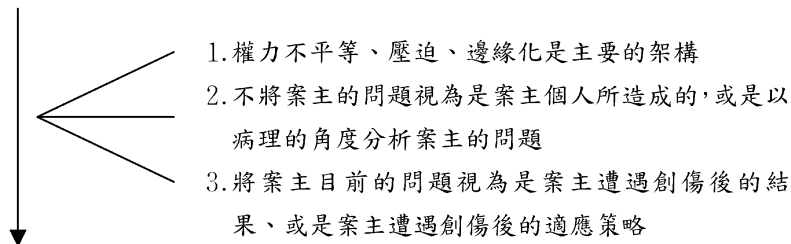
手進行改變，才是最有效的做法（Strier，2007）。然而 Danso（2007）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不僅要進行結構的轉變，社會工作人員也需要負擔起集結受壓迫人口的力量，而社會工作人員必須經由前述的幾個直接服務的步驟與過程，才能夠有效的集結受壓迫者的力量，同時也要讓她們形成相互支持的系統，才能有效加入倡

導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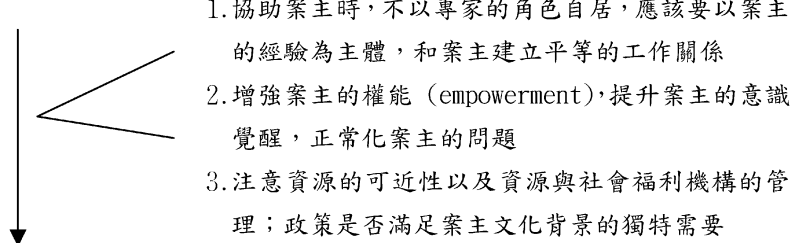
換言之，反壓迫實務工作的主要目標，著眼於社會結構／機會的不平等，對於某一族群的人所造成的排擠與邊緣化的影響，致力於這些結構面的不平等的消除。作者將反壓迫實務工作的主要觀點，摘要如下表：

表一：反壓迫實務工作模式摘要

預估主要方向與做法



干預的主要策略



終 極 目 標 -----集結有相同處境的人，運用與發揮集體的力量，改變不平等的結構、改善社會關係、改變造成壓迫以及社會排除的制度

參、反壓迫實務工作與家庭暴力受害婦女

一、結構不平等與家庭暴力之間的關連性

結構不平等和家庭暴力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討論，一是結構不平等與家庭暴力發生原因的關連性，另外一個則是家庭暴力發生之後，結構不平等對於家庭暴力發生後的處理方式的影響。

Anderson (1997) 與 Sokoloff (2005) 均指出，結構不平等的因素，的確會影響家庭暴力的發生，而 Sokoloff (2005) 和 Bograd (1999) 更指出，家庭暴力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種族、社會階層與性別因素，與結構不平等的因素相互加乘作用之後，是美國位處社會邊緣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原因。這並不是意指所有某一種社會經濟階層的人，就必然會有家庭暴力的產生，而是社會經濟階層、性別、種族的因素會影響某些人對於兩性間權力運用方式的選擇、或者是對於男子氣概的定義，當男性認為丈夫的權力大過妻子，自己可以用丈夫的權力要求或是控制妻子任何的事情，而且丈夫權力大過妻子就是男性氣概的表現時，家庭暴力就容易發生。Bograd (1999) 和 Bartolo (2001) 則指出，低社會經濟階層或是貧窮並不必然就會導致家庭暴力的發生，但是結構不平等之下所導致的失業或者是貧

窮，的確會讓家庭面臨較多生活的壓力，使得生活品質較差。Bartolo (2001) 認為較多的生活壓力與較差的生活品質，會衝擊一個人的自我價值感、對人產生消權作用、影響生活福祉，這樣的壓力很有可能以暴力行為作為壓力的宣洩口，就導致家庭暴力的產生。因此，Sokoloff (2005) 認為結構不平等的因素對於家庭暴力發生的關連性，和家庭暴力產生的心理因素一樣不容忽視的，而且結構不平等的因素，更是新移民婦女遭遇的家庭暴力問題中，絕不能缺少的角度。

當新移民女性在遭遇到家庭暴力之後，為什麼離開暴力關係或是報警並不是她們認為最好的選擇？Sokoloff (2005) 和 Bograd (1999) 都指出，主流社會以及警察系統對於新移民婦女的歧視，使得這些婦女在離開或是報警之後，更要面臨另外的生存上嚴酷的考驗，當然使得她們寧可選擇留在暴力關係當中。Bograd (1999) 和 Adelman (2004) 還指出另外使得新移民婦女不能離開的原因在於，這些婦女可能缺乏在主流社會中生存的條件、離開或者是報警也會讓這些婦女與原先熟悉的社區或是社會網絡隔絕，使得遠離暴力但是獨立生活更加不容易，因此讓這些婦女不選擇離開或是報警。

因此，受到結構不平等影響的家庭，雖然不一定會發生家庭暴力事件，但是當這類家庭發生家庭暴力時，結構不平等的

因素是一定是暴力成因的分析、受害者的後續決定與適應、干預方式的考慮，不可缺少的角度。

二、在台灣生活的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所面對的結構不平等與其影響

大陸籍以及外國籍配偶，在台灣屬於新住民，結構不平等的因素是否發生在他們的家庭之中？如果他們的確面臨結構上的不平等，結構上的不平等是否會造成家庭暴力？是否影響受暴後的適應？爲了分析這些問題，就必須先了解台灣社會結構面中，哪一些因素造成外國籍以及大陸籍配偶的不平等。作者從期刊文獻以及平面新聞報導中，所收集到的資料，逐一分析，發現現行台灣社會結構面中，形成對於外國及以及大陸籍配偶的不平等來源，計有：

1.公共論述、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對於外來配偶的觀念結構：公共論述是壓迫的來源之一，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公共論述污名化新移民的現象，導致新移民在接待國家的適應上更形困難的現象屢見不鮮。台灣原來就是一個父權社會，媳婦是外來人，也是夫家有問題時的待罪羔羊，因此台灣社會對於外來人口，多數帶有歧視的角度。台灣的公共論述中，對於大陸配偶所採取的角度是認為他們是假結婚真賣淫，或是大陸配偶容易是落跑新娘（蔡庭榕，民 96 年），已經是大家熟知的，即

使一些社會福利機構，例如：賽珍珠基金會，嘗試著呼籲大家將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視為是家人，但是這股力量仍舊抵擋不住其他極欲污名化這些配偶的公共論述。

2.迎娶外籍配偶的社會結構因素與家庭的觀念結構：王明輝（民 93 年）指出，台灣跨國婚姻主要分布在農漁村，這類型婚姻的台灣籍丈夫多數是教育程度較低、所得偏低、農工行業或是榮民身分居多，有部分甚至是身心障礙人士（頁 322）。換言之，這類型家庭多數在台灣整體社會結構之中，不論是婚姻市場或是就業市場，是屬於競爭力較弱的一群，也是結構中被排擠的一群，因此這類型家庭所受到的社會衝擊或是生活壓力，是比較大的。除此之外，這類型家庭的內部家庭關係，似乎也複製了本國籍配偶或是家人在台灣所受到的對待，來對待家中的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例如：同一家庭中外國籍配偶比本國籍配偶必須承擔較重的家務工作（黃森泉、張雯雁，民 92 年）；夫家剝奪外國籍配偶外出參加識字班學習台灣語言的機會，進而剝奪讓他們適應台灣生活的機會（陳源湖，民 91 年）；夫家控制外國籍配偶和娘家的連絡機會（陳庭芸，民 91 年；顏錦珠，民 91 年）。使得多數嫁到台灣這類型家庭的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承受的是來自這個家庭外在環境不公平以及內在家庭關係不公平對待

的雙重不公平。

3.台灣對於外國人的法令政策結構：台灣對於外籍配偶和大陸籍配偶在法令上有所規範，世界各國對於新住民也都有所規範，但是台灣的法令規定，明顯的對於大陸籍配偶不友善。台灣對於大陸籍配偶，在法令結構面的不平等，集中於居留權、工作權、以及身分的取得方面。除了大家熟知的，大陸籍配偶必須要等到在台居留年滿 8 年之後，才能申請台灣的身分證，足足比外國籍配偶多出 1 倍的居留時間，以及大陸籍配偶須在拿到居留權 6 年之後，沒有工作權，但是外籍配偶拿到居留權 15 天之後，即有工作權（陳小紅，民 94 年，民 95 年；修淑芬，民 96 年），明顯的讓兩種不同身分的配偶，一開始就面對結構不平等之外，跟大陸籍配偶身分有關的結構面的不平等，還包括即使大陸籍配偶取得身分證的 10 年之內，不能擔任公職的規定（廖元豪，民 96 年；蔡庭榕，民 96 年），限制了大陸籍配偶的工作選擇。蔡庭榕（民 96 年）更直指台灣「公權力待遇對我國人民優於外籍人民，而外籍人民則優於大陸地區人民……各項法律關係與保障上，對待外籍配偶優於大陸地區人民」（頁 209），對就人權的角度而言，因為來自的地區而加以限制機會，是一種不公平的設計。

除此之外，作者也發現，對於大陸籍配偶學歷認證的部分，也有結構上的不平

等，進而造成困難的來源。教育部對於外國學歷的認證，已經逐漸建立名冊，供各機關查證，然而對於大陸籍人士的學歷認證部分，名冊遲遲未公布，因此這部分目前是無法認證的（苗栗縣政府社會處，民 97 年）。這又是另外一個因為來自的地區而加以限制的例子。

另外，在申請入籍時，不論是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的家庭，都面對必須提出財力證明的要求，針對這一規定，大家抗議的重點在於，可以申請入籍表示這個家庭已經在台灣生活 4 年或是 8 年以上的時間了，如果缺乏新台幣 40 萬左右的財力證明，就無法申請入籍，是不具說服力的（苦勞社論，民 96 年）。然而矛盾的是，經濟因素與工作權是息息相關的，當工作權、學歷認證都有限制時，最後在入籍時再加上必須有財力證明，是否是符合邏輯的做法？這又是另外一個矛盾的結構。

這些台灣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和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遭遇家庭暴力問題，是否有關連？作者運用前面段落中，國外學者 Anderson（1997）與 Sokoloff（2005）對於結構不平等的因素與家庭暴力之間的相關文獻角度，加以分析。家庭暴力絕對是一個濫用權力與控制所產生的後果，Anderson（1997）與 Sokoloff（2005）認為，社會經濟階層會影響這類型家庭對於兩性間權力的運用、生活壓

力、或是自我價值感，進而發生家庭暴力，這是社會經濟階層與結構不平等的因素，造成家庭暴力的路徑圖。前述台灣的文獻指出，某些這類型家庭的確控制了這些配偶外出或是和娘家連絡的機會，這樣的控制是否會升級成為家庭暴力？這樣的控制是否和社會經濟階層有關？謝文彥（民 95 年）訪問在台灣的外國籍受暴婦女中發現，這些婦女的家庭中的確早就存在控制婦女身分文件的行為，因此我們目前可以合理懷疑但是無法直接斷言存在控制外國籍或者是大陸籍配偶證件或是和外界連絡機會的家庭，就一定會產生家庭暴力。除此之外，目前台灣現有期刊文獻當中，大部分的文獻都指出，大多數迎娶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的男子，是台灣社會中處於社會經濟條件屬於弱勢的一群，但是作者並未找到相關證據指出，這類型家庭暴力的產生，和他們家庭的社會經濟階層所面臨的結構的不平等是有直接的關係，亦即沒有直接證據可以呼應 Anderson（1997）與 Sokoloff（2005）所言，社會經濟階層影響這類型家庭對於兩性間權力的運用、生活壓力、或是自我價值感，進而發生家庭暴力。因此作者無法斷言，這類型的家庭所發生的家庭暴力事件，和他們家庭的社會經濟階層以及所面臨的結構不平等是有關的。目前無法斷言並不是代表兩者之間無關，而是我們需要嚴謹的實證研究結果才能回答，這是未來

可以努力的方向。

但是前述台灣對待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的社會結構分析，對照 Sokoloff（2005），Bograd（1999），以及 Adelman（2004）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預測到，當這類型家庭發生家庭暴力事件之後，受暴的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處在比起本國籍受暴婦女更為弱勢的處境。台灣的公共論述形成新住民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開端，就已經有了障礙，而且迎娶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的家庭的社會經濟階層或是家庭關係，使得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來到台灣生活，一開始就面臨至少雙重結構（夫家的社會經濟階層與夫家的家庭觀念結構）上的不平等。再者，台灣對於身分證、入籍、工作等的規定，已經設下重重的關卡，這種結構／機會的不公平，是會進而影響家庭在面臨困難或是重要決定時的阻礙。當入籍後所拿到的身分證，是大陸籍與外籍配偶在台灣生活最大的保障之一時，但是在拿到身分證之前，卻有結構／機會上的多重不平等，這就不難了解這些配偶在面臨困難時，為何無法做出最佳的決定。

Kirkwood（1993）指出，受暴婦女所能夠獲得的資源是決定能否擺脫暴力的因素之一。當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在面對台灣社會中的結構面的不平等之後，自然就落入了缺乏權力與缺乏資源的角色，當他們成為暴力的受害者之後，他們少的

可憐的資源與相互交錯的不平等讓他們的選擇是更少的，甚至離開夫家所面臨的台灣法律、台灣公共論述等的不平等，讓他們的生活重建過程困難重重。當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獨自在台灣生活，充滿困難與缺少資源的情況之下，就不難理解，為何這些受害者無法或是不願意離開暴力關係。

所有受暴配偶在離開受暴關係之後，都會有生活重建與復原上的問題，需要社會工作人員來協助，但是經由前述的分析，我們可以預測到受暴的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在生活重建與復原過程中，問題的內涵、所需的資源、所處的位置，和受暴的台灣籍配偶是不盡相同的。作者認為，現階段第一線的家庭暴力防治社會工作人員，已經有了兩性間權力濫用與控制而導致家庭暴力產生的概念，如果能夠再增加結構面的不平等的因素，亦即結合性別與新住民身分的角度，來理解大陸籍配偶以及外國籍配偶遭遇家庭暴力的原因、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的原因、生活重建與復原過程所產生的需求，這樣的多重角度，是可以更貼近這些配偶們的問題，進而提供有效的社會工作干預。

三、加入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現階段第一線家庭暴力社會工作人員，在處理受暴婦女時，所採行的工作策

略，根據劉珠利（民 97 年）針對家庭暴力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策略進行的研究初步指出，家庭暴力工作第一線社工員，除了運用制式的標準流程來協助案主之外，都認為家庭暴力創傷的復原是一個歷程，在這個歷程中，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事件要處理，而且不同的受創傷事件，所需要的復原的資源、復原歷程與時間，也不盡相同。針對這些受創傷的女性案主，多數社工員在整個歷程中，不分個案的階段，共同採用的處理策略有：

1.情緒支持：當案主遭遇創傷事件時，都會有強烈的情緒，包括悲傷、恐懼、失望、憤怒、焦慮不確定等，在這樣的情況下，社工員都給予相當多的情緒支持，協助案主將情緒平復，面對問題。

2.動機與力量的激發：案主在面對一些困難的決定時，例如：離婚，案主經常會出現反覆、猶豫不決的情況，甚至退縮，使得問題無法獲得改善。在這樣的情況下，社工員就必須運用不同的方式來激發案主的動機與力量。例如：鼓勵案主為了爭取孩子監護權，重整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給予案主性別方面的意識，讓案主了解自己是權力不平等下的受害者。經由這樣的方式，激發出案主的動機，化為行動處理問題。

3.社會資源的提供：本研究受訪社工員的重要協助工作，就是提供案主所需要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補助、轉介律師

有關離婚以及小孩監護權的問題、陪同案主向法院爭取保護令、緊急安置於庇護中心、以及後續生活重建過程中的實質問題（如：工作）等。雖然這是社工員的重要工作，也是案主認為很有幫助的項目，但是社工員還是發現，現階段的資源仍然不足以應付案主的需要，因此社工員還是會向宗教的相關機構，尋找資源提供案主。

4. 社工員的生命體驗與自我揭露：社工員也會在適當的時候，和案主分享自己的一些對於生命創傷經驗或是家庭關係的經驗，這樣的自我揭露幫助社工員能夠傳達同理給案主。當然，社工員也認為，這樣揭露是要視案主的狀況使用，不是所有的案主都適用。

5. 陪伴與不放棄：社工員表示，對於女性案主而言，一個讓她們感受到溫暖與關懷的關係，並且不會因為案主的反覆而放棄她們的關係，是很重要的策略，畢竟這是女性案主所需要的。並且，受創傷的案主，處在危機狀態下，暫時喪失部分功能，例如：無法思考或是陳述，這時候等待與陪伴案主，就是一個重要的方法。

6. 家人關係的處理：社工員也提到，有時候必須介入處理案主的家人關係，才能使得案主復原，原因在於案主家人的做法或是想法，會阻礙或是減緩案主的復原。

西方的文獻中，強調的協助創傷復原的策略在於幫助案主集中注意力於問題的

解決上，以減低 PTSD 的反應（Frazier, 2000）。台灣社會福利機構所提供的資源以緊急安置、保護令的申請、經濟補助、法律扶助為主，目的也是在於集中焦點於問題的解決上。但是如同在前言的部分中所提及的，現階段的工作模式有性別不平等的角度，但是缺乏結構不平等與新住民身分的角度。前一段的討論當中，我們了解到台灣社會結構對在台灣的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的不平等，影響他們在面臨家庭暴力問題之後的選擇、方向、與生活重建，讓她們成為弱勢中的弱勢。因此，在所述的現階段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模式中，結合台灣外國籍以及大陸籍配偶所面對的結構／機會的不平等，以及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原則，是值得發展出的工作模式。作者嘗試在現階段社工員所熟悉的工作模式中，融入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原則，提出以下的建議，供家庭暴力防治社會工作人員參考：

1. 對案主情緒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2. 在案主的動機與力量的激發部分：除了原先社會工作人員就使用的、讓案主了解自己是兩性權力不平等下的受害者之外，社會工作人員也可以就案主的遭遇，先行辨識案主是那一些結構不平等之下的受害者，例如：父權結構與社會文化結構交互作用下的受害者，或是父權結構與法律結構交互作用下的受害者。然後讓案主從這樣的角度理解與分析自己的遭遇，這

樣的策略可以一方面降低案主的自責與自我貶低，一方面可以讓案主從自己遭遇的洞察中，激發案主採取改變的力量。另外，社會工作人員還可以更明確的告訴案主，她的某些不理想的因應策略，是受到不平等對待後，在無其他選擇之下的結果，不是案主的病態問題。事實上，這樣的角度也可以用來幫助社會工作人員理解，為何有一些受暴的配偶，會有相當不客氣的態度對待社會工作人員，因為在不平等的關係中，這些受害者已經缺乏尊重的因應策略了。因此社會工作人員必須和案主建立平等的關係，在案主經驗到平等的對待之後，才能夠逐漸的修正因應的策略。

3.社會資源的提供方面：這部分可以分為資源的提供與後續的資源倡導兩部分。由於大陸籍以及外國籍配偶身分的關係，在資源的提供上，有時會礙於身分的規定而有所限制，尤其是在生活重建過程中的接受職業訓練或是找工作的部分，更是一大困難。社會工作人員除了儘可能的為她們爭取資源之外，也需要從工作過程中發現的短缺卻又重要的資源，加以倡導。

如果案主必須安置於安置中心，社會工作人員必須檢視，安置中心的規定，是否會形成案主於安置期間，又再次的遭遇結構／機會不平等的經驗？如果有，那麼社會工作人員也應該致力於安置中心不平

等結構的改變。例如：提供不同宗教信仰的服務，不只是提供機構所信仰的宗教服務；提供多元的飲食種類；提供不同語言的刊物；或者是安置機構的工作人員的態度必須不帶歧視等。

4.陪伴的部分：社會工作人員除了原先就有的、溫暖與尊重案主的步調的態度之外，還需要加入反壓迫實務工作原則中的充權策略，亦即不以專家的姿態和案主一起工作，而是以平等關係和案主一起工作，從這樣的過程中，一一針對案主所面臨的問題，討論出可行的解決策略，協助案主逐步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重新獲得對於自己生活的控制力量。另外，由於案主在決定離開夫家獨立生活後，很有可能案主將會失去所有的網絡與支持，因此社會工作人員的支持與陪伴，對案主顯得更為重要。同時，社會工作人員也可以介紹來自相同地區的案主，讓她們互相形成支持的網絡。

5.社會工作人員的最終目標，還是要致力於社會上結構不平等的轉換。例如南洋姐妹會在平時是外國籍配偶的互助網絡，對於一些對外國籍配偶不公平的議題，就會適時的結合外國籍配偶的力量，集體發聲，就是一個值得效法的方式。

至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生命體驗與自我揭露，以及家人關係的處理部分，一方面和反壓迫實務工作的精神較不契合，另外一方面以和目前實務工作的真實狀況不相

同，因為社會工作人員是屬於本國籍，經驗上較不雷同，自我揭露的機會不大，另外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娘家的人也不在台灣，無法有機會接觸，因此作者並未在這兩個部分和反壓迫實務工作的原則結

合。作者將現階段台灣第一線家庭暴力防治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模式，與作者加入反壓迫實務工作所建議的工作模式，摘要成下列之對照表。

表二：台灣協助受暴婦女社會工作實務原則與加入反壓迫實務工作原則對照表

協助策略	台灣協助本國籍受暴婦女的實務原則。	加入反壓迫實務工作處理大陸籍與外國籍受暴婦女的實務原則。
情緒支持	情緒支持，協助案主將情緒平復，面對問題。	情緒支持，協助案主將情緒平復，面對問題。
動機與力量的激發	激發出案主的動機，化為行動處理問題。例如：鼓勵案主為了爭取孩子監護權，重整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給予案主性別方面的意識，讓案主了解自己是權力不平等下的受害者。	就案主的遭遇，先行辨識案主是那一些結構不平等之下的受害者，例如：父權結構與社會文化結構交互作用下的受害者明確的告訴案主，她的某些不理想的因應策略，是受到不平等對待後，在無其他選擇之下的結果，不是案主的病態問題。和案主建立平等的關係，致力於安置中心不平等結構的改變。
社會資源的提供	提供案主所需要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補助、轉介律師有關離婚以及小孩監護權的問題、陪同案主法院爭取保護令、緊急安置於庇護中心、以及後續生活重建過程中的實質問題（如：工作）等。	社會工作人員除了儘可能的為她們爭取資源之外，也需要從工作過程中發現的短缺卻又重要的資源，加以倡導；改變安置機構中對不同文化安置婦女的不公平對待。
陪伴	傳遞溫暖與關懷，不會因為案主的反覆而放棄案主。	除了溫暖與尊重案主的步調之外，介紹來自相同地區的案主，讓她們互相形成支持的網絡。
最終目標	案主生活重建。	致力於社會上結構不平等的轉換。
社工員的生命體驗與自我揭露	和案主分享對於生命創傷經驗或是家庭關係的經驗，幫助社工員能夠傳達同理給案主。	無
家人關係的處理	處理阻礙或是減緩案主復原的家人關係。	無

肆、反壓迫實務工作在台灣推行尚須努力之處

本文的目的在於提供家庭暴力社會工作人員，在既有的注意兩性平等權力的工作模式／策略之外，加入另外一個新住民身分考慮的工作取向。這個模式在台灣尚屬一個新的角度，因此要使這個模式能夠成為社會工作人員可以運用的模式，是需要加以推動的。台灣的社會工作教育，對於壓迫與被壓迫的概念，以及反壓迫實務工作，仍有努力的空間，因此作者認為首先必須在社會工作學校教育以及社會福利機構的在職訓練著手。然而，如何在社會工作教育中加入反壓迫實務工作的概念？美國密西根大學課程中的兩組對話方式，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這種課程設計，就是將學生根據自己的團體身分分組，例如：種族、性別、居住的城鄉等，同一團體身分的人在同一組，課程中要有不同的團體身分組別，然後授課老師可以請不同組別同學根據自己團體身分的經驗（不一定是自己的，可以是自己團體身分相同的人的經驗）討論同一議題，例如就業問題，然後在課堂上進行對話，從對話中可以逐漸釐清結構對人的影響，進而去體會結構不平等對人的影響（Sakamoto & Pitter, 2005）。在台灣，現階段的種族並不像北美洲那麼多元，因此授課老師可以先行了解學生的團體身分之後，根據學生的團體身分分組。

其次，我們對於現階段台灣社會結構

中有哪一些結構造成新住民的壓迫？現階段的了解還是有限，因此持續辨識出台灣社會結構中有那一些造成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的壓迫，讓這些結構的因素讓大家了解，並且致力於結構的轉換，是後續應該努力之處。

此外，外國籍或是大陸籍配偶家庭的家庭暴力發生原因，和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關係，是否有關連？是一個未來我們必須研究的方向。唯有從事這類型的研究，才能讓我們對這類型家庭的的家庭暴力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伍、結語

重視案主的獨特性以及根據案主的獨特性提供切合需要的社會工作服務，是社會工作重要的價值原則。當台灣的新住民愈來愈多時，社會工作人員就必須對於新住民的經驗與切合新住民經驗的服務模式，有更多的知識與了解。本文嘗試從結構不平等與反壓迫實務工作的角度，來了解新住民女性所遭遇的家庭暴力問題與可行的服務模式。從現有的文獻分析中發現，台灣社會中存在對於大陸籍或是外國籍配偶不平等的結構，使得她們在台灣的生活與適應，一開始即存在阻礙，在她們變成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之後，這些結構上的不平等，又更加阻礙她們的選擇與生活重建。現階段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模式集中於關注兩性間權力不平等，本文提供了有關種族／新住民身分、社會階層權力不平等的角度，來分析家庭暴力的相關

問題，並根據這個角度的干預策略，和目前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模式融合，提供融合後的協助策略，這些策略包括：以平等的態度和新住民案主一起工作，提供新住民案主情緒支持，運用兩性間權力不平等及濫用的角度與結構不平等的多重不平等角度預估新住民案主家庭暴力問題的角度，提供新住民案主所需要的社會資源並且為她們所需要但是缺乏的資源進行倡導，注意安置中心所提供的資源是否照顧

到被安置的不同國家配偶的獨特需要，並且注意中心工作人員的態度，避免造成再度的歧視等不平等的對待，提供並且協助新住民案主形成生活重建過程中的支持網絡，結合新住民案主的力量促成不平等結構的轉換。讓社會工作人員在協助新住民案主時，除了應該有種族／新住民意識的提醒之外，能夠有更為具體的工作方法。

（本文作者劉珠利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 參考文獻

王明輝（2004）台灣外籍配偶結構性弱勢情境之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7，320～334。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8）委員會介紹 Available Online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1380&CtNode=602&mp=5>. Retrieved on 7 July 2008.

行政院主計處（2008）婦女婚姻暴力探討，Available Online: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7951035271.pdf>.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2008）婦女福利服務外籍配偶與大陸籍配偶，Available Online <http://soc.miaoli.gov.tw/web/nwm/qal.asp>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苦勞社論（2007）限制外籍配偶入籍的民脆誘惑，Available Online <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5801>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桃園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2008）95 年度婦女緊急安置人數，Available Online <http://dvpc.tycg.gov.tw/index.php?act=detail&id=538>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2008）「高雄市原住民、大陸籍、外國籍家庭暴力與性侵害被害人現況析探」Available Online <http://safesex.kcg.gov.tw/95022001.pdf>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修淑芬（2007）台灣外籍、大陸籍配偶之社會問題與解決之道 Available Online: <http://dspc.moi.gov.tw/ct.asp?sltem=1276&ctNode=452&mp=1>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謝文彥（2006）外籍配偶遭受婚姻暴力因應策略之質性分析，中央警察大學罪防治學報，7，131～160。

- 陳小紅（2006）跨界移民：台灣的外籍與大陸新娘，*亞洲研究*，52，61～92。
- 陳小紅（2005）跨國婚姻中人權問題的探討：來台生活大陸配偶案例之檢視，*國家政策季刊*，4：1，141～164。
- 蔡庭榕（2007）從平權論外籍與大陸配偶之差別待遇，*國境警察學報*，7，175～214。
- 邱淑蘋（2007）東南亞外籍配偶報案意願之研究，*國境警察學報*，7，19～45。
- 陳庭芸（2002）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研究——以印尼與越南新娘為例之比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芬（2003）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兼論服務提供者對大陸新娘的假設及其對服務提供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101，182～199。
- 陳源湖（2002）外籍新娘識字教育實施之探析，*成人教育*，68，25～34。
- 黃森泉、張雯雁（2003）外籍新娘婚姻適應與子女教養問題之探討，*社會科教育研究*，8，136～169。
- 顏錦珠（2002）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珠利（2008）台灣受創傷女性復原經驗與協同合作協助模式之研究：社會工作與宗教的合作期中報告，編號：NSC 96-2412-H-029-006-MY2，未出版。
- 劉珠利（2007）台灣社會工作人員女性性別角色信念及其影響之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95-2412-H-029-009，未出版。
- 劉珠利（2004）婦女主義的觀點對大陸及外籍配偶現況的啓示，*社區發展季刊*，105，44～54。
- 廖元豪（2007）試用期的台灣人？Available Online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iaobruce/3/1291185005/20070721110227/> #centerFlag Retrieved on 18 July 2008.
- Adelman, M. (2004) The Battering Stat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Poverty*, 8, 45-64.
- Anderson, K, L, (1997) Gender, Status, and Domestic Violence: An Integration of Feminist and Family violence Approach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 655-669.
- Bartolo, L. Di (2001) The Geography of Reported Domestic Violence in Brisbane: A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Australian Geographer*, 32, 321-341.
- Bograd, M. (1999) Strengthening Domestic Violence Theories: Intersections of Race, Clas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5, 275-289.
- Boushel, M. (1994) The Protective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Anti-Oppressive, Cross-Cultural and Cross-national Understand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4, 173-190.

- Danso, R. (2007) Emancipating and Empowering De-Valued Skilled Immigrants: What Hope Does 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Off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17.
- Dominelli, L. (1996) Deprofessionalizing Social Work: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Competencies and Postmodern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6, 153-175.
- Frazier, P. A. (2000) The Role of Attributions and Perceived Control in Recovery from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 5, 203-225.
- Kirkwood, C. (1993) *Leaving Abusive Partners*. Thousand Oak: Sage Publications.
- Langley, J. (2001) Developing Anti-Oppressive Empowering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Older Lesbian Women and Gay M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1, 917-932.
- McDonald, P. & Coleman, M. (1999) Deconstructing Hierarchies of Oppression and Adopting a 'Multiple Model' Approach to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Social Work Education*, 18, 19-33.
- Mullay, R. (1993) *Structural Social Work Ide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d Inc.
- Peterson, R. d., & Krivo, L. (2005) Macrostructural Analyses of Race, Ethnicity, and Violent Crime: Recent Lesson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nnu. Rev. Sociol.* 31, 331-356.
- Pollack, S. (2004) 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Women in Prison: Discursive Reconstructions and Alternative Practi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4, 693-707.
- Sakamoto, I., & Pitner, R. O. (2005) Use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 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Disentangling Power Dynamics at Personal and Structural Leve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5, 435-452.
- Sokoloff, N. J. (2005) Alternative Visions to Ending Domestic Violence: Using a Race, Class, Gender, Sexuality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 Annual Meeting. Philadelphia, U.S.A.
- Strier, R. (2007) Anti-Oppressive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A Preliminary Defin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7, 857-871.
- Valtonen, K. (2002) Social Work with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Developing a participation-based Framework for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part 2.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2, 113-120.
- Williams, C. (1999) Connecting Anti-racist and Anti-oppressive Theory and Practice: Retrenchment or Reappraisa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9, 211-230.
- Wilson, A., & Beresford, P. (2000)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Emancipation or Appropr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0, 553-573.